

“尼玛办学样式”与 牧区教学经验探讨

阿 波

一 “尼玛办学样式”产生的土壤与条件

“尼玛办学样式”产生于阿坝州若尔盖县热当坝乡(今红星乡),时间是阿坝州牧区民主改革后。该乡藏族牧区社会就是其产生的土壤,民主改革是其产生的条件。因此,弄清民主改革前该乡社会组织的特点和民主改革对该社会组织的影响,对于了解“尼玛办学样式”产生的原因是十分必要的。

(一) 二元结构的藏族游牧部落社会

红星乡位于阿坝州北端。民主改革前,这里是若尔盖十二部落之一的热当坝部落,一九五八年民主改革后,建立热当坝乡,一九六六年成立热当坝人民公社,一九六八年改名为红星人民公社,一九八四年又改名红星乡。(文中涉及该地不同时期的情况时,皆以当时的名称为准)。

阿坝州藏族牧区社会在民主改革前表现为游牧部落形态。游牧部落是当时该地区自成一体的社会单元,部落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可以看作一种部分相加的关系,各部落的社会组织结构亦基本相同。因此,只须解剖热当坝一个部落,就足

以我们对“尼玛办学样式”产生的社会基础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与其它藏族游牧部落一样，热当坝部落的社会组织结构为典型的二元结构。(见图1)。在该结构中，一元为落后的畜牧业生产，另一元为以寺院为核心的上层建筑，这两个子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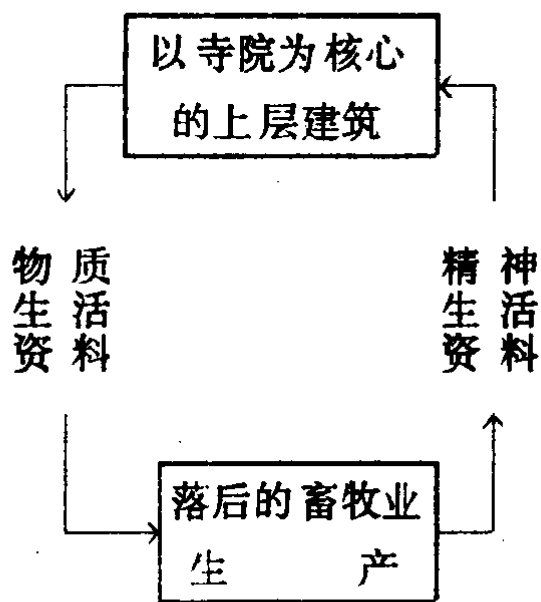


图1:藏族游牧部落社会组织

相互耦合在一起，畜牧业生产单位向寺院输出物质生活资料，寺院则把输入的物质生活资料变换为精神生活资料向畜牧业生产单位输出。

热当坝有两个寺院，一是纳摩格尔底寺，这是一个独立寺院。下属18个寺院；另一个为康萨寺，属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管辖。这两个寺院都属藏传佛教(即喇嘛

教)格鲁教派。该地区全民信教，两寺以宗教活动为依托基本上包揽或控制了该地全部上层建筑活动。

热当坝部落在民主改革前夕总人口为1400人，纳摩格尔底寺有僧人700人，康萨寺有僧人231人。前者大部分来自其它部落或地区，后者基本来自本部落。两寺来自本部落的僧人数占总人口的32%，^① 社会负担系数之高。生产单位几乎将其剩余产品输入寺院，本身只能勉强维持简单再生产。寺院向生产单位输出的人大都念经，以满足牧民宗教信仰方面的需求；主持节日庆典等文化活动，满足牧民的文化消费需求；维护和调控牧民间的社会关系；参与或影响牧业行政管理；把保存的某些实用的民族传统文化和技术传播到民间，

对生产起一定作用,等等。虽然这种二元结构还十分简单,但它却难有较大的和较迅速的生长。只有这种二元结构被突破了,属教育子系统的“尼玛办学样式”,才可能从这一社会组织的土壤中萌生出来。

(二) 藏族游牧部落社会组织与其自然环境的基本关系

在藏族游牧部落的社会组织中,畜牧业生产子系统主要由两个要素组成,一是牧民,一是牲畜。牲畜给牧民提供生产生活资料,牧民饲养牲畜,二者间是耦合的。牲畜采食牧草,成为社会组织从自然环境中吸取养料的基本渠道。民主改革前,牧草的生长基本是自然力量所为。牧民对其影响十分微弱,因此,牧草与决定其生长的各种自然因素又自成系统,成为社会组织的自然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见图2)由于社会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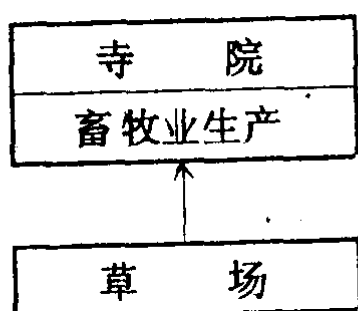


图2:草场与藏族游牧部落的关系

对草场无能为力,而只是单纯地由草场给自己提供生活源泉,因而此间的关系就不是一种耦合关系,而是一种典型的“人靠天吃饭”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草场的自然状况决定着社会组织的状况。

热当坝位于松潘草地北缘,海拔为3130米,该地属高山大陆季风气候,主要特征是寒冷潮湿。②土地总面积为602平方公里,草场面积为746192亩,可利用草场面积为554102亩,亩产饲草332公斤,1只羊单位应该占有草场5.49亩。③这些情况说明,在自然状态下,草场所能提供供给牲畜的饲草是一个不变的限量,高海拔、恶劣气候和各种疾病亦限制着牲畜的发展,畜牧业生产因而只能停留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

自然组织除了草场外,还包括未被开发的大量资源,但

由于宗教的禁忌, 这些资源基本上没有被牧区社会所利用。

因此, 在热当坝这样的藏族游牧部落与其自然环境的关系中, 没有可以促进社会组织大幅度地和迅速地生长的机制, 自然界在短时间内也不可能聚集起强大的物质力量输入社会组织来突破其二元结构, 包括“尼玛办学样式”在内的新的组织成分不可能由此萌生出来。

(三) 藏族游牧部落社会组织与其人文环境的基本关系

热当坝地处川甘交界处, 且紧靠藏族农区, 境内还有一个从事农业的回民村寨。这种地理位置和与另一兄弟民族同处一地的情况比之牧区腹地有一定的特殊性, 与外界交往比较便利。纳摩格尔底寺为全藏区喇嘛教格鲁派的八大寺院之一, ④也是川西北草地最大的两所寺院之一, ⑤这种地位对该地与外界的交往起到了积极作用。

构成该地社会组织的人文环境的地区主要有附近藏族、回族农区, 其它藏区和汉区。民主改革前, 热当坝藏族游牧部落与附近藏族、回族农区之间交往的主要内容有以畜产品换粮食和其它生活用品的商业往来和宗教活动方面的往来; 与其它藏区之间的交往以宗教为主的往来; 与汉区之间交往主要是商业往来, 即以畜产品换布、粮、茶、盐、生产生活器具等。

可以看出, 该地社会组织与其人文环境间确有某种耦合关系, 但是, 这种耦合的信息量相当小, 靠这种自然交往所获致的信息是不足以改变该社会组织的二元结构的。

(四) 藏族游牧部落组织的文化技术需求状况与“寺院办学样式”

在民主改革前, 热当坝藏族游牧部落组织的两个子系统中, 畜牧业生产子系统所需要的文化技术信息量非常

少,大致有这样一些方面:牧民须懂藏语口语,以应付日常交往的需要;掌握放牧牲畜的要领和屠宰牲畜以及简单加工畜产品的技能;领会宗教精神,学会遵守道德行为规范和习俗,等等。至于对兽医等实用生产技术的需求,在当时未自觉,更没有施行教育来获得满足。因而牧民们基本上是文盲。寺院子系统对文化的需求量较大,对技术(主要为非生产性技术)有一定需求,主要用来为宗教活动服务。大多数僧人有藏语文和佛教经典的基础知识,少数僧人在藏语文、佛教经典和藏族传统文化方面有较深造诣。因此,寺院教育发展较好。

在纳摩格尔底寺庞大严密的寺院组织中,设有“扎仓”这一机构主持念经、教经等事务,下设参理扎仓(佛学院,即显宗学院)、居巴扎仓(密宗学院)和丁可扎仓(时伦学院)。显宗学院教授宗教哲学等内容。一个学僧在此学20~25年后,经考试合格,可获格西学位,该学位按学科和层次的不同又分为帕新巴格西、多热巴格西和拉热巴格西三种。密宗学院教授事续学等经典,并重修持,学僧学10年左右,考核合格,可获昂热巴学位。时伦学院教授经论和历法、数学、天文等,学僧学10年后,通过考试,可获仔热巴学位。此外,各学院还设有音乐、舞蹈、绘画、历史、地理、雕塑、藏医学等选修课。⑥

寺院教育保存与发扬了佛教文化和藏族传统文化,有其社会历史意义。但寺院教育基本上只与寺院的其它子系统耦合,其所代表与执行的是寺院的培养传教人才的功能,寺院因为有了发达的教育才能更多更好地为牧民念经,通过满足牧民的信教需要从而摄取更多的物质生活资料,以壮大自己的势力。很明显,寺院教育通过整个寺院子系统输出的功能,没有与牧业生产活动本身耦合,并且,在二元结构中,教育也不可能从寺院独立出来,成为社会组织的一个子系统,因而

无法造成一种组织生长的局面。这种办学样式我们姑且称之为“寺院办学样式”。

(五) 民主改革对藏族游牧部落社会组织的改造

所谓民主改革，即是对解放后在藏族牧区进行的社会变革的总称。阿坝州牧区是在一九五八年开始民主改革的，热当坝是试点地区之一。改革的主要内容有：废除草山占有制，实行牧民的集体所有制；废除寺院的剥削和特权；废除群众对寺院的债务，由国家代群众偿还。同年底，民主改革即告结束。到一九五九年，整个阿坝地区基本完成了对农牧业、手工业、私营商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建起了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⑦

民主改革的本质是社会历史的进步，不因民族而异，只是由于这股潮流涌自汉区，故反映着包括热当坝在内的藏族游牧部落社会组织与其人文环境的关系。民主改革所包含与挟带的信息主要成分如下：政治上解放了被剥削、受压迫阶级，这与当地社会组织所包含的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内容是相斥的；经济的信息量一方面通过政治军事行动和人才支援显示出来，另一方面通过修建公路、开通邮路（热当坝一九五九年通汽车，一九五九年通电话）、替牧民还寺院欠债。对牧区进行资金扶持表现出来，这对落后的牧区经济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以现代科学技术观念为重要内容的思想文化开始占领意识形态领域，这与宗教唯心主义和各种迷信思想是相对立的。在如此强大且势不可挡的社会信息流面前，藏族游牧部落社会组织的二元结构就显得十分脆弱了。

民主改革后，热当坝成立了乡政府，社会组织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见图3）在这个新的结构中，寺院子系统基本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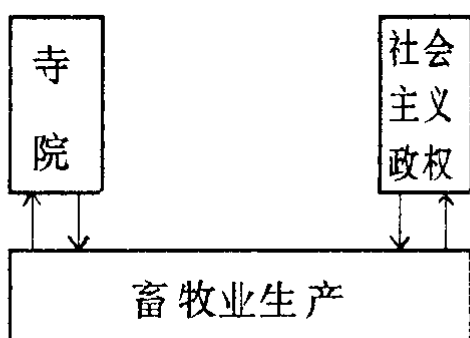


图3:民改后藏族牧区社会组织结构

只作为宗教机构存在,它从生产子系统输入物质生活资料,向信教的牧民输出宗教信息。生产子系统本身在所有制上得到了改造,这使之与社会主义政权耦合起来,政权子系统从生产子系统输入一部分物质生活资料,变换后输出生产与行政管理等内容,这种新的耦合关系的

建立给整个社会组织的生长创造了条件,其间耦合的内容有利于组织从环境中吸取信息能力的增强,从而为各种新的子系统,包括教育子系统的产生提供了可能。至于寺院子系统与社会主义政权之间,不能认为是一种耦合关系,当然,后者对前者要输入一定的管理,这种比较特殊的结构关系是造成社会组织不稳定的根由。

(六) 现代学校教育的兴起与“汉区办学样式”

民主改革后,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首先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文盲率高,有文化又能充实政权机构的人凤毛麟角。为了巩固新政权,发展牧区社会,兴办现代学校教育便成了当务之急。一九五九年,热当坝乡第一所学校——康萨小学建立,一九六〇年,该乡境内的小学校增至4所。一九六四年,康萨小学有了首届十几名毕业生,并办起了高小班。这时在热当坝乡的范围,教育子系统已经名副其实地建立起来了。

现代学校教育在牧区只有普通基础教育一种内容,并且,普通基础教育从教学用语,教材,课程设置到学制、招生与升学方式等都采用的是汉区的做法,因此,我们姑且称这

种办学样式为“汉区办学样式”。该办学样式的结构地位与作用一开始就异于“寺院办学样式”，表现在：前者只与寺院内的其它构成因素耦合，结构地位在子系统层次，后者一开始就与整个社会组织的其它子系统耦合，结构地位在组织层次；前者只为寺院培养人才，后者为整个社会培养人才。

“汉区办学样式”引入牧区社会组织后，在其前期与社会其它子系统是基本耦合的。(见图4)社会其它子系统向该办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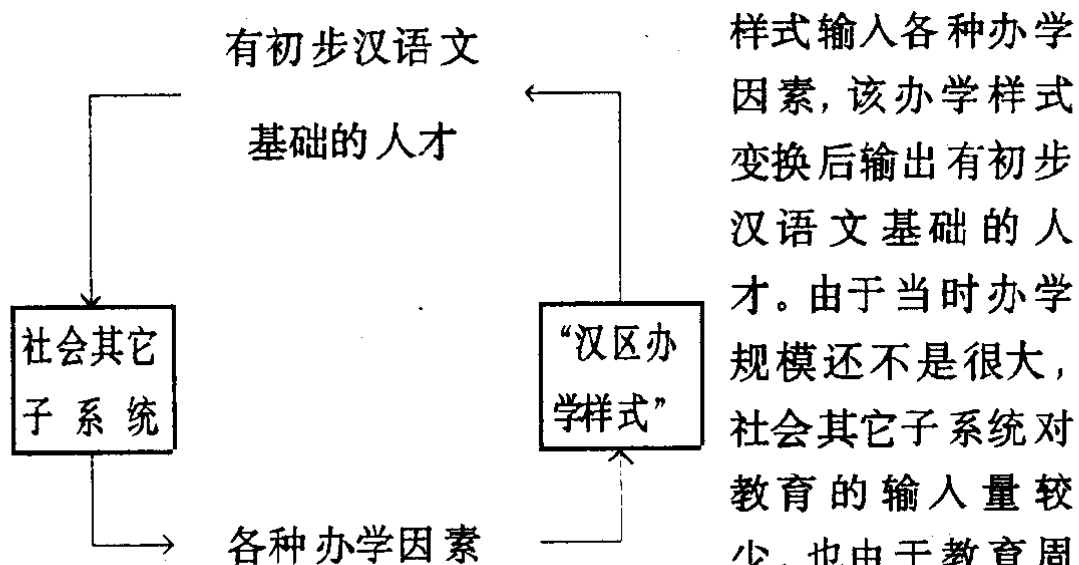


图4：“汉区办学样式”与藏族牧区社会其它子系统的耦合情况

样式输入各种办学因素，该办学样式变换后输出有初步汉语文基础的人才。由于当时办学规模还不是很大，社会其它子系统对教育的输入量较少，也由于教育周期较长，教育的输出量亦很少，加之

当时属人才紧缺时期，因而耦合不成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部门依照“汉区办学样式”举办的普通基础教育与当地社会组织的其它子系统的耦合状态就逐渐动摇了，只要我们将“社会其它子系统”作一定程度的还原，原因就会显露出来。(见图5)在这里，我们把“社会其它子系统”分成两个部分，即畜牧业生产子系统和行政及公共事业等子系统。畜牧业生产子系统直接向“汉区办学样式”诸校输入学生总数的绝大部分(包括学生的费用)，且间接通过行政及公共事业等子系统向学校输入物质生活资料等办学所需；行政及公共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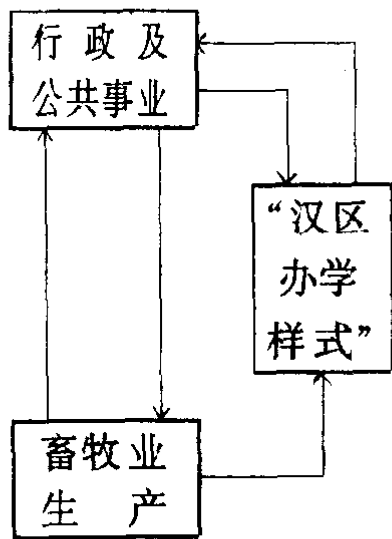


图5：“汉区办学样式”与畜牧业生产子系统和行政及公共事业等子系统的关系

业等子系统一方面向畜牧业生产输出管理等服务，另一方面通过变换其从畜牧业生产子系统和人文环境中输入的信息向“汉区办学样式”诸校提供输出；“汉区办学样式”诸校从社会其它子系统普遍获得输入，但却只向行政及公共事业等子系统提供输出。问题就在

这里！也就是说，按“汉区办学样式”举办的各种学校一开始就没有与畜牧业生产子系统耦合，到了非要耦合不可的时候，又一时难以实现耦合。既然“汉区办学样式”的输出不能成为畜牧业生产的输入，其与社会其它子系统间原来具有的那种耦合稳态必然要随着耦合量的增加而遭到破坏，牧民们既然从教育那里得不到他们需要的那种毕业生，便索性不再把子女送到学校来，入学率于是降低，普通基础教育自然滑坡。这就是全国教育热潮掀起之后尤其是在生产责任制实行以后，牧区的普通基础教育出现危机及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所在。

一九八四年，我州藏族牧区按“汉区办学样式”举办的学校入学人数明显减少，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若尔盖县有关部门向“尼玛办学样式”的技术学校下达了40人的招生任务，结果来了100多名新生！纯增长率为70%，其奥秘何在？要弄清这个问题，先让我们看一看“尼玛办学样式”是怎样从藏族牧区社会的土壤中，在民主改革所创造的条件下生长出

来的。

注：① 引自杨明编著《藏族游牧部落及社会主义现代化》，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P2, P126~127。

② 引自《若尔盖草地畜牧业》内部铅印资料, P6~7。

③ 同②, P15。

④ 参见《安多史海》，寺院木刻本。

⑤ 同①, P196。

⑥ 同①, P196~204。

⑦ 参见《阿坝藏族自治州概况》(征求意见稿), 内部铅印资料, 第七、八章。

二、“尼玛办学样式”的生长机制与过程

“尼玛办学样式”作为民主改革后热当坝乡藏族牧区社会组织所生长出来的别具一格的教育新芽, 萌动于一九六〇年。不过, 它的萌生方式与“汉区办学样式”不同, 它是当时该社会组织已具有或已获得的各种信息在随机运动中受组织诸子系统的需要吸引而或然结合的结果, 只是到了它基本成形后, 才得到有关部门的认可与扶持, 从而被纳入了教育发展的总格局之中。在“尼玛办学样式”初萌之时, 教育对象为成人, 教育内容为藏兽医, 教学用语基本上是藏语文, 这也就足以证明我们对其萌生方式的论断。

随机产生的事物, 从萌动到成形有一个较长的在涨落推动下的运动过程, 这一过程只是或然地导致某种稳态, 不具有一意确定的必然性。在这个较长的过程中, 事物很有可能“胎死腹中”, 反之, 在历经考验之后最终存活下来, 就说明

该事物具有不同寻常的生命力,说明它与组织其它子系统耦合得很好,因为耦合组织生存的关键所在,不过,这种随机的特点使我们在对这类事物的生长机制和过程进行分析与认定时有一定困难。

(一)“尼玛办学样式”萌动之初的组织结构、地位与功能

在民主改革后的热当坝乡,和在川西北草地所有其它地方一样,与兴办现代学校教育同样急迫的就是建立兽疫防治体系,这与畜牧业生产是当地基本产业的实际是相符的。畜牧业生产子系统需要一个直接为之提供兽防服务的公共事业子系统,且建立该子系统的条件已大体具备。于是,在一九六〇年,该乡正式建立了兽防站,接着建立了与之配套的土制药厂。该兽防站为集体所有制单位,罗让尼玛为最初的5名职工之一。一九六一年,罗让尼玛接任站长职务。①

兽防站初建时,面临诸多困难,其中最大的是站内职工(多为翻身牧民)文化技术水平低,尼玛就兼做职工文化技术辅导员,帮助他们学习藏语文知识和藏兽医技术。随着职工们文化技术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的提高,兽防站有了较好的工作效益,在本地获得了一定声誉,尼玛教育活动面因而有所拓展。这就是“尼玛办学样式”的萌动。

热当坝乡兽防站的工作成就亦主要表现在其兽疫防治方面。一九六〇年,热当坝乡境内流行马疥癣病,死亡马匹达180多头,后因乡兽防站认真诊治,采用自制的“兰花侧金盏”配方,此疫得到控制。②一九六三年,马疥癣又在若尔盖县范围流行,损失严重,经宣传、推广、采用“兰花侧金盏”验方后,疫情很快得到控制,到一九六五年,该县就扑灭了此病。此后,县里大力提倡向热当坝乡兽防站学习。③这些情况说明,“尼玛办学样式”萌动之初,其在当时社会组织结构中的地位

与功能与由教育部门举办的普通基础教育有较大的区别。(见图2 /)“尼玛办学样式”在其萌动之初,作为站内的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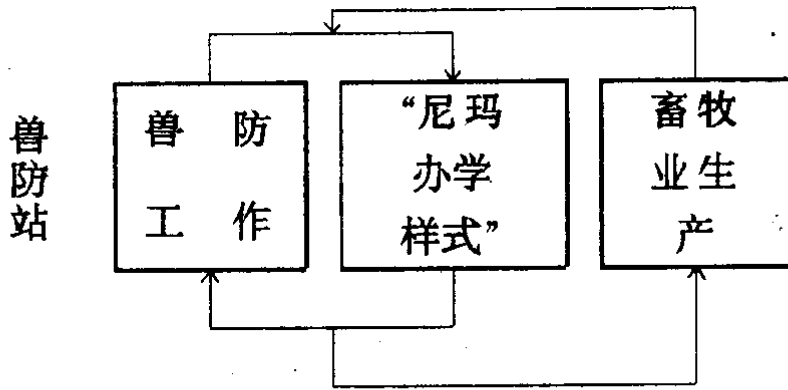


图2 /。“尼玛办学样式”在其萌动之初的结构地位与功能

化技术培训形式,尚未直接与畜牧业生产子系统相耦合,直接与生产子系统耦合的是兽防站这一整体,

畜牧业生产子系统向兽防子系统提供一定量的物质生活资料,兽防子系统则把这种输入加以变换,然后向畜牧业生产子系统输出为牲畜防病治病这种功能。只是在当时,兽防子系统内又分出两个更小的子系统,即站内的兽防工作和站内的文化技术培训。兽防工作没有一下子全部消耗从畜牧业生产子系统输入兽防子系统的物质生活资料等信息,而是将其中的一部分用于搞文化技术培训,培训工作将所获得的信息加以变换,然后又向兽防工作输出文化技术人才,这样一来,兽防站的整体功能就得到了增强,从而就能更好的与畜牧业生产子系统相耦合。要说明的是,兽防站内的两个更小的子系统是从功能角度而不是从人员角度划分的,虽然这段时间,萌动之初的“尼玛办学样式”也为非兽防站其它方面培训过人才,但这只是强化了它作为兽防子系统的的一个构成部分的功能,尚未使之分化出来直接作为社会组织的一个子系统或独立学校。当然,这种强化的意义对其最终分化出来是十分重要的。

此外，在热当坝乡兽防站建立初期，参加站内文化技术培训活动的主要人员(包括尼玛)，其正式身份、职业都是兽防人员，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尼玛办学样式”萌动之初的结构地位。

从藏族牧区社会的兽防子系统而不是从别的子系统萌生出来，正好显示了“尼玛办学样式”的根底所系。

(二) “尼玛办学样式”胚芽的主要构成因素——罗让尼玛及其它

从后来发展的情况看，在阿坝州藏族牧区以至整个藏区，绝大多数兽防机构的文化技术培训功能都没有进一步发展，象“尼玛办学样式”这种从兽防机构分化出来终成气候者更是绝无仅有。

“尼玛办学样式”在最初作为藏族牧区小规模培训兽防人员的一种教育活动形式，其所需要的因素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分解开来，可能有如下一些：(1)藏语文教员。虽然牧民中能胜任这一工作的人极少，但寺院喇嘛教员不少；(2)兽医教员。不论懂藏兽医，还是西兽医、中兽医，不论是藏族，还是别的民族，能胜任这一工作的人应当说还是有一些，一九五九年，县畜牧兽医工作站就有17名兽医干部，由县站组织起来的散居各地的藏兽医人员共有24名，④(3)对教育本身的热忱和抱负。这一点在当时教育部门的干部、教师中是不少的；(4)教育活动场所，用兽防站的场所即可；(5)教育活动经费。亦可挤用兽防站经费；(6)学生。这更不是一个难题。可见，在当时热当坝乡的社会组织内及其人文环境中，这些因素并不缺乏，这表明“尼玛办学样式”的确可能产生。但为什么就只产生这一个，而没有遍地开花？关键就在于这些因素作随机运动时只在热当坝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较好的初始结构。

这就是:(1)(2)(3)个因素都恰好集中在了一个人身上,而且,在这个人身上,这三个因素的分量又都远远超过了对兽防人员进行一般性培训的要求。这个结构本身是非常牢固的,剩下的只是他如何在人生的风浪中勇敢、沉着地去捕捉机会和争取条件了。机会有了,条件有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尼玛办学样式”随即出现了。

罗让尼玛(“罗让”藏语意为“智慧”,“尼玛”意为“太阳”)他出生在若尔盖阿米塘一个藏族牧民家庭,一九三三年出家纳摩格尔底寺剃度学经,到一九四二年,他一直在该寺学习藏文文法、正字法、佛教哲学的初级和高级部分,诗学和词藻学诸课程。一九四三年,尼玛离开故乡,不远万里,前往甘孜德格竹庆寺,西藏哲蚌、扎什伦布、甲央更庆等寺求学。主攻医学、声明学、工巧明、戏剧学、因明学和天文历算学,并于一九四八年在哲蚌寺面对数万僧众,考试答辩合格,荣获帕新巴格西学位。一九四九年下半年还乡,在纳摩格尔底寺全面复习,深研哲学,一九五三年又获多热巴格西学位,其后赴青海嘎让寺、甘南夏河拉卜楞寺深造诗学、声明学。一九五八年民主改革后,尼玛还俗到热当坝乡塔玛村务牧,担任过村会计。一九六〇年被政府吸收到乡兽防站工作。尼玛的前半生,足迹踏遍藏区,历尽旅途艰险,备偿人世辛酸,对藏传佛教经典和藏族传统文化造诣很高,对人生觉悟之道,拯救众生之理体会极深。

单从学问讲,还难以解释清楚尼玛办学的动机,照我们的理解,尼玛后来所以能走上从事现代教育活动的道路,恐怕与其“游方僧”的经历有关:他前半生几乎一半时间都在云游四方,这使他既能在文化知识上饱受各大名寺的哺育,又能在思想与性格上免受其刻板教规的约束,从而比一般的高

僧更具有灵性、自由精神与博大襟怀。尼玛毕生致力于藏兽医研究与教学，可能与其早年求学中的一次遭际有关。在西藏时，他曾遇到一户善良的农民，有段时间，他几乎全靠这户人家的布施过活。这家人仅有两头耕牛，是维系全家生活的命根。但不久以后，一头牛被当地寺院摊派去了。又过不久，另一头也病了。佛也拜了，经也念了，牛的病却未见好转。他们知道尼玛学识匪浅，于是向他求助，把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而他却无能为力，最后眼睁睁看着牛死去，眼睁睁看着那户人家陷入生活的绝境。这事对他激发很大，使他对那浩繁的佛教经典的价值产生了某种疑虑与困惑，也使他把学习的重点转移到了医学等比较实用的学科上来。后来他多次感慨地谈起这事，并言，根据那牛的症状，其患的可能是炭疽，此病只是一种常见病，而非疑难杂症。尼玛所以立志办学，主要的激励机制和因素是现代教育已经兴起，其力量与意义已经在这位学识渊博者面前显现出来，这使他有意借现代教育的方法来培训兽防人才。尼玛所以不拘泥于现代学校教育的正规办学形式，恐怕与当时的兽防工作对人才需要的急切现状有关。尼玛所以没有使自己的教育活动停留在兽防站的文化技术培训上，而是使之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原因在于他志存高远，满腹经纶，不断进取，这实在不是凡俗之辈可与之等量齐观的。所有这些都说明一点，就“尼玛办学样式”本身而言，其产生，在随机中有确定性，在或然中体现着必然。

尼玛其人是“尼玛办学样式”胚芽的灵魂。民主改革后，热当坝乡兽防站的建立对该样式的萌生是一个机会。当时，尼玛和旦科被要求在人医与兽医间各选其一，旦科选择了人医，尼玛选择了兽医——他把握到了第一个机会。于是，我们在前面所列的(4)(5)(6)个因素也具有了，“尼玛办学样式”的

胚芽便悄无声息地萌发了。

(三)在涨落推动下趋于稳态(1960~1975)

这里所谓的稳态是指“尼玛办学样式”成为独立的学校后与社会组织其它子系统之间所构成的稳定的功能耦合状态。

“尼玛办学样式”作为兽防机构内以文化技术培训为基本内容的教育形式,能否发展为自成一体的学校,首先要看它有没有一个“吸引中心”。回答是肯定的。这个“吸引中心”实际上就是该社会组织对兽防人才及其它畜牧业生产人才的需要(预期输入)与其为培养兽防等人才所能承担的费用等支出(预期输出)之间的相关系数。以及该预期输入与预期输出的最少量同办一所学校的起码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这两个系数越大,吸引力就越强,“尼玛办学样式”从胚芽发展为独立学校的速度越快,否则就越弱,越慢。比如,设办一所学校在一个教学周期至少须有50名学生及相应的师资。教学设施和经费等,社会在相应时间里亦至少需要50名毕业生,同时又能支付培养这50名毕业生的费用,那么,其间的相关系数为最大,虽然学校尚未建成,但导致建校的“吸引中心”已经出现,且具有最强的吸引力,这时,如果社会组织的反馈控制子系统比较灵敏,得力,则学校可以迅速建立,即或不是这样,学校建立亦不会费时太久。

“尼玛办学样式”初萌之时,该乡兽防等方面人才十分缺乏,需求旺盛,但从经济等实力看,却不可能在短期内培训大量人才以满足这种需求,预期输入与预期输出相关系数不是很高,由较低预期输出所限定的学生数及相关因素亦达不到办一所正规学校的起码量,因为热当坝乡在民主改革前总人口不到1500人。但是,如果我们跳出该乡的范围,从整个若尔

盖县来考虑,情形就很不一样。一九六二年,该县牧业总人口为16747人,⑤牲畜总数超过50万混合头。⑥若按每20人中有1名专兼职兽防人员或每600头牲畜配一名专兼职兽防人员,则该县应需800多名兽防人才,并且,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牲畜头数的增多,这种需求还会大幅度增长。况且,当时的牧区社会,不啻兽防人才缺乏,其它方面的人才亦缺乏。所以,牧区社会对实用型的技术人才的预期输入是有的。一九六二年,若尔盖县普通基础教育在校生人数为1652人,教育经费94499元,生均教育经费为57.2元,教育经费占全县财政支出的12.37%。设增办一所50名学生的兽防人员等技术人才的培训学校,需教育经费2860元,等于增加县财政支出的0.37%,这个输出是该社会组织能够提供的,其间,办学规模可随人口和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由此看来,在若尔盖全县范围内“尼玛办学样式”生长为独立学校的“吸引中心”是存在的。不仅如此,学校一旦建成,还可为外县以至外省培养人才,前景是乐观的。

由于“尼玛办学样式”从教育内容上讲属牧民教育、成人教育和技术教育范畴,当时不在发展教育的总体规划之中,而有关的教育活动则由有关部门各自组织进行,这种情形使得“尼玛办学样式”只能靠随机涨落向“吸引中心”推进,这个推进的过程从另一角度看实际上是“尼玛办学样式”把该县兽防部门在各地的各种培训活动加以集中和骤合的过程,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自然进化过程。

对最初一段时间的“尼玛办学样式”,有人称之为“帐篷学校”,有人称之为“医生学校”。随着教育学和工作效果的明显化,尼玛把招收学生的范围扩展到该兽防站之外,先前的学生这时成了他教学上的助手,他把这种扩大教学规模的办